

治史不能“狗崽队化”

学者呼吁研究历史不能一地鸡毛,当观大治得失

李白先后结了4次婚?孔子的身高为2.21米,与姚明几乎一般高?近来史界的猎奇之风甚嚣尘上,有一地鸡毛之势。“要警惕史学研究目前出现的‘狗崽队化’。”学者孙江在回国讲学时如是表示。近日,在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联合召开的“纪念乔志强先生诞辰80周年暨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李长莉提出,“细碎化和描述性两大缺陷,已成为制约史学研究发展的瓶颈,尤其是在社会史领域”。李长莉此语,获得了与会学者的共鸣。

上世纪80年代初,社会史研究还是历史研究领域的新角色,但在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以后,社会史研究炙手可热,成为史坛主角,很多学者尤其是年青一代的学者都“趋之若鹜”,但问题也同时出现了。“研究题目都很细小,很琐碎,某一个村、某一个庙,或

者描述某一家族如何如何,一拥而上,却形不成整体的研究,也没有一种理论的解释。”李长莉说。“好像对史料的占有和搜集越趋多元化就越能证明对史学拥有一种解释的霸权,拥有了不同于传统文本类别的史料就具有了认知真实历史的资本,这确实是一种误区。”学者杨念群举例说,譬如,所谓新文化史研究出现一种趋向,专门挖掘旧式文人的隐私生活,越怪越好,社会史则专门发掘乡村里边那些稀奇古怪、为文明的城市人所不知道的东西,或者是研究只是为了满足人们对历史的猎奇赏玩心态,成为人们饭后茶余之谈资,沦为地摊读物,“但对于历史真相的发现无有助益”。李长莉告诉记者,学术研究需要一定的基础研究,需

要研究具体的社会现象,但这些只是研究的初步,历史研究的目的还是通过个案透视解释中国历史变迁的普遍性理论,所谓“读史治史当观大治得失”,而不是“为了叙事而叙事,为了描述而描述”。李长莉强调:“从具体研究上升到普遍的理论,才是成熟学科的一个标志。”

史学研究的“碎片化”究竟是何时开始的呢?杨念群告诉记者,原来的史学研究都是大叙事、大框架,特别关注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规律,但缺乏对鲜活细节的洞察,也没有人的活动身影,因此其解释框架显得粗糙无趣。“所以,我们开始眼光向下,开始做社会史,觉得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基层社会其实很重要,中国的社会史由此起步,力图回避一些相对空

洞的大的结构和大的叙事。好处就是我们对基层社会和日常生活有了很多的面向和了解,但问题是,可能会钻到牛角尖,满足于对一些很细碎的场景或者稀奇古怪的材料占有而自得。”为此,杨念群呼吁,对“眼光向下”的研究方法的评价要慎重,首先要肯定其价值和贡献,史学研究也需要多元解释的途径,只是对个案的发掘中,不要放弃对整体史的思考。

李长莉还表示,可用“综合法”“理论法”和“跨学科法”来矫正史学的“碎化”倾向。她指出,“综合法”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来研究历史问题。比如国内三大社会史中心之一的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多年来进行的山西地方史研究、近年来开展

的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就是从不同层面解读历史事件、厘清错综复杂的历史脉络。“理论法”,则是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来观照中国历史问题,比如公民社会的理论等。

史学研究要警惕“叙事化”,并不是“不要叙事”,只是不要“为了叙事而叙事”。李长莉表示,历史是纵向的,研究历史要看到前后变迁的脉络,所以必须要记叙。但“如果仅仅把历史叙事理解为讲故事,谁都可以写,这是最大的误解。”

乔志强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史学家,是中国社会史重要的奠基人,由他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社会史专著,在史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先生逝世10年,诞辰80周年之际,在先生生前任教的山西大学举行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陈香 来源:中华读书报)

红颜知己的三种境界

第一种境界是《诗经》中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一份可遇而不可求的机缘。因为距离,故将一切美丽收于一身。

通常情况下,老婆占有男人,情人分享男人,而红颜知己则是塑造男人,她充分地挖掘他的潜力,并通过完善男人帮助男人来完成自己知己的使命。所以,红颜知己是男人的另一个魂灵,她时而近在咫尺,时而在水一方,但你能感受到她在生命里存在;她不见得赞成你的人生观价值观,但绝对尊重你,并对你笃信和相知。

红颜知己其实就是跟你一起点燃生命之火的那只温存的手,男人往往因为她,人生才变得活跃起来。因此,红颜知己才是旷世的绝代佳人。遗憾的是,大多数女人的聪明刚刚够不上做红颜知己,而男人欲望的陷阱也刚好令她做不成红颜知己,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女人本来想扮演红颜知己后来却沦为情妇或陌路的根源。

故红颜知己实在是男人的奢望,女人的不甘。第二种境界是宋词,“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的诱惑。从本质上看,人是抗拒不了诱惑的,比如老婆和情人就没有诱惑——她们把它变成了现实;而红颜知己巧妙在把诱惑保持住了,她因此而成为男人生命里积极向上的蔚蓝。

当老婆令你头疼,情人让你心疼的时候,红颜知己则让你哪儿都不疼。她浑身洋溢着亲和力、想象力,带给你如沐春风的愉悦;

是“不一定天天见,月月想,但什么时候见了都是故知重逢”的快慰;

是你“无论在何方、发生何事都能感受到的、在这个世界上某个角落还有人会关注你、倾听你”的那份感动。

她虽然淡淡地从你身边走过,只偶尔回眸,可你却不由自主地要跟在她身后,因为她对你生命的独特阅读方式,实在是你今生无法抗拒的诱惑。

而诱惑,不正是推动人前行的动力么?

第三种境界是副对联,上联“招之即来”,下联“挥之即去”,横批“全为你好”。

这一层境界将红颜知己与其他任何关系的女人区别开来:老婆是招之不来——事实上是她招你你必须来,情人是挥之不去——她还想要名分呢,怎肯轻易放弃?另有一种人,妓女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横批却又是“全为钱好”。

只有红颜知己才最肯把主动权交到你手上。因为是朋友,所以没有性,没有爱,没有粉红色的情感,也没有痴缠缠缠恩恩怨怨的阴雨天;又因为是知己,故她能把所有的出发点都放在“为你着想”这个角度,本着理解,本着支持,也本着友谊的光彩艳艳,她宽容着你亲密着你,她实在是已把知己一词的内涵推上了出神入化的顶端。

你想,人生得一知己已然不易,知己倘若又红颜,那该是怎样的艳丽。

(蓝艺 来源:红颜知己)

“熬”住人生

我们经常用竞技来比喻人生。但竞技毕竟只是一时,而人生的竞赛其实非常漫长,什么都不是一眼看得到头的。

一时的春风得意其实算不了什么事,一时的失败其实也不能算数,直到人已经死去,竞技还可能不会完,所以,在漫长的人生竞技场中,人还是一定得忍下悠悠岁月。一本有关林彪的书写林彪与越南的国防部长武元甲会见。他告诉我,与美国对抗只有一个字:熬。熬住就是胜利。其实这一个字的确道出了人生的一种真谛,美国那么强大,和它对抗当然不容易,但只要“熬”住,最后越南还是赢了。但真正熬得住又谈何容易。林彪自己已经过了“熬”的阶段,成了接班人,最后却到底熬不住,遂有温都尔汗的一劫。人生在大历史中,当然只是白驹过隙的一瞬,但对于我们的个体生命来说还是漫长极了,片刻的辉煌太诱人,眼前的好处也太实在,熬得住太难。所谓“熬”就是对

于自己的事情不轻易放弃,不随便离开自己的位置,就在那里一步一步地努力,有时候就好像龟兔赛跑的那只乌龟,未必跑得快,但“熬”得住,却能笑在最后。

人生中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大阪举行乒乓球世界锦标赛的电视转播中,刘国正和金泽洙在男子团体赛上的比赛异常激烈,刘国正几乎老是要输,但居然能够九死一生地赢下来。也是“熬”出来的胜利。当然这仅仅是一场比赛。但他旁边的教练蔡振华的经历就更加让我感慨了。当年我还是学生的时候,蔡振华就是乒乓球运动员,以旋转球拍著名,他能够将球拍在手中飞速旋转,使对方无法知道他两面不同的胶皮,接不住他的球。但那时我们都是另外一位名将郭跃华的球迷。当时蔡振华是

赢不了郭跃华的,郭那时候是绝对的第一主力。而且后来国际乒联又限制了旋转球拍,蔡振华就黯然退场了。那个时候,郭跃华的辉煌和蔡振华的黯淡恰成对比。但郭此后就从商,渐渐淡出了体育界,后来就销声匿迹了。而蔡振华则在这一行里“熬”着,直到有今天的大红大紫,成了中国乒乓球队的总教练。现在还有几个人记得过去的世界冠军郭跃华呢?而蔡振华是家喻户晓的。郭跃华的生意可能也还不错,但毕竟和蔡振华没法比了。人生中进进退退是寻常事,关键是能够“熬”得住。

其实,文人的生涯“熬”也不可或缺。有些人偶尔才华一闪,就再也不见了,终究难以让人记住。我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有位小说家叫薛勇,写都市人的心态写得非常妙,可

惜作品不多,后来也不见再有作品问世。另外有一位姓尚的作者,曾经有过让我叹服的小说,我曾经非常喜欢他的作品。可惜也没有坚持下来。现在都被人遗忘了。其实,作品的数量也是要紧的。像贾平凹和莫言,从出道以来就没有中断写作,作品非常多,让人有了印象。未必他们每本书都写得好,我记得早年贾平凹还曾经被人批评过有粗制滥造的情况。现在提起中国文学的大家,没有人能够绕过他们。这非常容易理解。在十部书中写两部杰作的概率总比仅仅写两部大得多。他们写一本书失败了,被批评了,就去写另外一本。别人说这本不好,他还拿得出另外一本,而不是为一本书喋喋不休,纠缠不清。其实这种心态非常健康和顽强,最终你会发现他们已经走在

给“大师”李敖挑错

闲来无事,有时也看看香港凤凰台的专栏节目《李敖有话说》。李敖几次提起别人称他为“大师”,他说:“看,称我为大师。”但听起来,别人称他为“大师”,似有戏谑的味道,而他自己倒是认真地自认为是“大师”的。

学费专精。李敖是哪一门的“大师”呢?

李敖在台湾大学读的是历史系,他遇事都讲究拿出证据来。搞历史必搞考证。他大概就是史学“大师”和考据学“大师”吧。

我们且看他拿出来的是些什么样的证据。

1896年10月,一生为革命奔走辛劳的孙中山,在伦敦被清政府驻英使馆诱捕,准备偷运回国处决。后经其师康德黎多方营救,清使馆才被迫释放孙中山。李敖说,孙中山在清政府驻英使馆曾跪地求饶,证据是该使馆的一位官员的文章中如是说。

考据之学,以清代为最盛。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十三章列指其“特色”有十,其三云:

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

李敖提出的只是孤证,而且这个孤证是政治的敌对方提供的,那就更应该谨慎对待了。虽无反证,最多也只能“姑存之”,怎么就能贸然作为“定说”呢?

鲁迅的杂文集《热风》,收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随感

录》二十七篇。李敖说,其中有一篇是周作人写的,鲁迅把它收进自己的杂文集了。证据是周作人晚年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如是说。

鲁迅的《准风月谈》收入瞿秋白的《王道诗话》和《出卖灵魂的秘诀》,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但从未听说《热风》中收有周作人的短评。这又是孤证。周氏兄弟早期志趣大致相同,后来在文学和政治上分道扬镳,各行其是。周作人在抗战中还屈身事敌,当了汉奸。他的一封信怎么就能作为“定说”呢?

李敖说,1927年,鲁迅被蔡元培聘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月薪三百元,定期支付四十九个月,共计一万四千七百元,折合黄金四百九十九两。

这一次李敖没有拿出“证据”来。

但证据是有的,那就是发表在2000年《新华文摘》第三期上陈明远的文章《鲁迅一生挣多少钱?——文化人经济生活》。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受聘任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月薪三百元,支付四十九个月,共计一万四千七百元,按照当时的黄金价格折合黄金四百九十九两,这些数字都有了。李敖在引用这些材料的时候,按照通例,应该是说明出处的;但他没有说,难免让人感到遗憾。还是在《清代学术概论》第十三章中,

梁启超所列清代朴学(即考据学)“特色”之六云:“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为大不德。”“大不德”,这就不只是学术问题,而是人品问题了。

李敖说,台湾有人说他搞的是“游戏史学”。从上面他提供的这些“证据”来看,又岂止“游戏”而已。

另一样使李敖颇感自得的是他的文学创作。

他说,只写短篇小说算不得文学家,文学家应该有长篇小说。因此,鲁迅不能算文学家,李敖有长篇小说《北京法源寺》了。在谈到白先勇的时候,该书只说他的《台北人》“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并未提他的长篇小说《孽子》,而《台北人》只是十四个短篇小说组成的集子。可见小说并非只以长度取胜,而是以“艺术水平”论高下的。鲁迅

的短篇小说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又岂是《北京法源寺》所能企及的?

识字,看似与学问无关,但可说是做一切学问的起点。从未见有不识字的学者。李敖号称“大师”,读错的字音却不少,真可谓白(别)字连篇。例如,道行(音横),误读为道行(音形);扁(音偏)舟,误读为扁(音匾)舟(他还开玩笑说:“陈水扁的船。”)。洋泾滨(音帮),误读为洋泾滨;平上(音赏)去入,误读为平上(音尚)去入;衣(音义)锦还乡,误读为衣(音一)锦还乡;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读音的正误,牵涉到对字义的理解。道行(音横),指僧道修行的功夫,可引申为技能本领,道行(音形)又是何义呢?船有大小之别,扁(音偏)意为狭小,扁舟,小船也。扁(音匾)舟又是什么样的船呢?浜为小河沟,滨乃水边之义,两者岂可混淆?上(音赏)为汉语四声之一,上(音尚)乃方位词,汉语四声与方位何干?衣(音义)是动词,意为穿。《论语·雍也》:“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衣(音义)锦还乡,旧指富贵后穿锦绣之衣回乡,向亲友乡里夸耀。衣(音依)是名词,古时上为衣,下为裳。《诗经·邶风·绿衣》:“绿衣黄裳。”亦泛指衣裳。《论语·里仁》:“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锦也是名词,指有彩色花纹的丝织品,或以此类丝织品做的衣裳。

做学问离不开读书,但信马由缰、漫无边际地读书,则非治学之道。李敖说话中广征博引,仿佛一个饱学之士,其实与学问完全搭不上边。老子曰:“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此之谓也。李敖于历史研究和文学创作迄无多大成就,如此读书,或为其原因之一。看《李敖有话说》,得知李敖是很推崇毛泽东的。临末,抄录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与李敖“大师”共勉: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冯异 来源:博览群书)



狂人李敖漫画像
(来源:华夏经纬网)